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

孙钦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要: 社会发展理论作为马克思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对中共党史学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它规范着党史研究的构架并引导其发展方向。中共党史学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框架下,深入阐释党的历史发展的动力、主体、阶段、本质和趋势,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论断。新时期党史研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要求以辩证、整体的观点进行理解和把握,反对把它归结或导向为“经济决定论”“单一模式论”甚至“理论假说”,代之以其他理论标准解释党的历史发展;要求深入分析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正确看待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问题和挑战,警惕西方社会错误思潮对我国社会发展道路性质和方向的歪曲、异化。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社会发展理论; 社会形态; 中共党史学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268(2018)04-0001-09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是考察社会历史发展、揭示人类社会变迁规律的基本理论范式,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共党史学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决定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是这一学科的理论基础。关于社会发展的演进,国内学者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开展研究,承认社会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并重视分析和挖掘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但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家却认

为社会历史发展并不具有客观规律性和可预测性,进而否定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性。也有一些学者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肢解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或持“单线论”把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误认为是一切民族的发展道路,每一个社会阶段不能取消,也无法跨越。又或持“多线论”突出马克思某一时期的思想,看不到其思想发展的连续性,使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成为一个个断裂的、前后矛盾的理论碎片。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

* 收稿日期: 2017-12-21 修订日期: 2018-06-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共党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3&ZD057)

作者简介: 孙钦梅(1981-),女,山东莒南人,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党史国史理论研究。

断,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认识和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理解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澄清和应对西方社会思潮的误解、挑战,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这既是重大时代课题,又是中共党史研究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对党史研究的指导价值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是一个带有普遍性、本质性和原则性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包含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理论系统,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无法回避。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中集中阐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理论,其主题包括社会发展的规律、机制、动力、类型和道路等,其基本内容涉及社会发展的主客体、统一性和多样性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一般理论。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世界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提出改变了19世纪历史学以民族、国家为研究范围和对象的书写方式,把世界历史描述为一个统一的过程。它研究的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结构和一般规律,但又对各国的发展道路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特征进行研究,并科学地定义各个国家和历史阶段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为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方法论指导。就中共党史学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坚持社会发展理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唯物史观作为人类社会最一般规律的理论,为马克思分析社会历史发展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在马克思之前,人类对自身历史的探讨与诠释,其实质都是思辨的唯心史观,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唯物史观的创立,使社会历史观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及现实问题思考中发现,必须从社会存在和生产关系中寻求历史之源,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通过对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科学辨析,马克思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归结为生产力推动下生产关系不断生成而又被取代的自然发展过程,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从而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以及时代的演变发展规律。同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又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旨趣,就在于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辩证的自然历史过程,正是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者的辩证运动中,马克思找到了唯物史观的现实基点,真正解开了社会历史之谜。

其次,社会发展理论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的重要依据。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和现实条件的科学分析,指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并明确提出了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两个决不会”思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指明了最后发展趋向。看不到社会发展理论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中的这种主体地位,实际上就等于在逻辑上否定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价值取向。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用逻辑的方法阐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理论,揭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运动规律,是正确认识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需要,并能帮助我们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分析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从而对其中的假社会主义思潮提出批评和解决方法。

再次,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科学揭示了社会形态更替、演进的规律。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说,但对社会形态的概念及其演变的基本轨迹仍做了大量的论述和概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深入探索了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几种所有制形式,并分析了社会形态历史演变的内在原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进一步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

抗形式。”^[2]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这一历史过程表现为不同的社会形态,并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每一次社会形态的更替,都是在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被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他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3],把人类历史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哲学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不研究社会形态的变迁就无法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发现人类社会历史的规律,更谈不上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正确走向。中国共产党成立近10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最大成就正在于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出发,深入揭示了中国社会既遵循人类历史演进一般规律、又具有自己鲜明民族特色的独特发展道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研究极大地开阔了党史研究者的视野,增强了其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和党的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

最后,社会发展理论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所提供的不是一种机械的、线性的方法论,而是既兼顾世界整体,又深入其局部,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表现为“世界历史”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的辩证统一。前者从社会历史中“世界历史”的普遍性角度出发,认为“世界历史”过程既是生产社会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过程,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的扩张过程;后者从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角度出发,关注全球化浪潮中的民族性和跨越式发展。马克思指出,东方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历史”,但在特定的条件下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直接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两个方面辩证统一构成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要义和基本方法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又是“顺序性”与“跳跃性”的统一。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演进在总体上呈现了社会历史的基本走向,同时也是就整个人类社会的高度抽象化的理论,强调社会的发展必然要受客观规律的制约。恩格斯说“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4]²⁷⁸但它又不排斥东方社会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而在演进中呈现出的特殊性甚至不平衡

的跳跃性,更不要要求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按照同一的发展“图式”并进。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为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意义,它使我们对社会历史的把握能够形成一幅清晰的整体图景,并能具体认识到这一图景之下不同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本质上体现了现实社会历史发展“一般”与“个别”、“整体”与“部分”、“世界性”与“民族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这种辩证的方法是科学认识人类历史演进过程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在中共党史研究中,重视这一科学方法论的意蕴在于,它能帮助我们正确理解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社会、寻找适合本民族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可以认为,以探求历史发展规律尤其是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是中共党史学认识中影响最具深远意义的部分。正是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在党史研究中的指导和运用,使中共党史学成为具有理性认识高度的知识形态。中共党史学认识如果缺少了这种理论形态,将会是肤浅的、漫无目的的甚至是错误的。

二、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在党史研究中的运用和发展

社会发展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历来是中共党史学家研究的重点。没有科学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指导,中共党史学就不能成为一门科学,揭示党的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历史本质。在中共党史学研究中,其他一切理论也都以此为中心。具体来说,中共党史学需要回答这样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近代中国的社会和革命性质是什么?近代中国革命的前途和道路,及其同世界革命和道路的关系如何?中国社会运动有着怎样的特殊规律?怎样认识党的历史发展的动力和主体问题?从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需要汲取哪些经验教训,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逻辑是什么?等等。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既是中共党史学科理论建设的需求,也是新时代的要求。

中共党史学家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

与党的历史发展相偕而行。在党的历史发展和具体研究实践中,他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毛泽东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党史学家,但他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指导来研究中共党史,并注重以历史研究的视角来阐述和分析党的历史问题,为中共党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张静如指出“严格说来,毛泽东的每篇著作对中共党史研究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作用。”^[5]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研究不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本出发,也不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命历史哲学的“循环往复论”出发,而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从近代中国社会的国情和实际出发,寻求一种新的社会发展理论,解答近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总体来看,毛泽东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论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中国革命应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二是科学阐释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三是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

革命理论是考察党的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内容。张静如认为“革命是唯物史观极为重要的社会现象”,“从旧的社会形态向新的社会形态转换,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6]。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明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第一步,须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以改变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个同时带有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并具有“过渡形式”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是革命继续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7]666-675}。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中又对党内存在的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空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错误思想进行了着重批评,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8]。有论者指出,“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卓越贡献,“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是毛泽东一生中的重大理论创举之一”^[9]。也有论者指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就是指导中

国成功地跨越了“卡夫丁峡谷”,实现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关于落后国家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预见^[10]。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革命理论问题上也经历了曲折,集中体现在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和以王明为代表的“一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主张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安插一个资本主义单独发展的社会阶段,反对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陈独秀认为,尽管资本主义有其自身的缺点和可怕的罪恶,但它能够清除封建生产制度的缺点与罪恶,增加社会的生产力,所以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们宁可忍受资本主义的罪恶,来代替封建军阀的罪恶”^[11]。目前史学界关于“二次革命论”的研究多集中在它的原因及来龙去脉问题上,主要存在几种观点:一是“二次革命论”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影响,陈独秀对五种社会形态说做了僵化的理解;二是“二次革命论”错误主要来自马林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三是“二次革命论”在1923年是根本不存在的,陈独秀充其量只是共产国际的代言人;四是陈独秀没有辩证地理解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这是“二次革命论”产生的真正根源^[12-17]。“一次革命论”则是在革命前途问题上的另一种错误倾向,主张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合并去完成。这两种观点都是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片面化理解。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前者是后者的必经阶段,只有认清二者的区别和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7]651-652},从而有力地驳斥了上述两种错误观点。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论述,同样体现了他对社会发展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推动了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创新。通过考察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他发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并构成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贯穿社会主义发展的始终。这就形成了他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矛盾动力论”。但他又指出,与资本主义社会剧烈对抗和冲突性的基本矛盾不同,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且可以通过社会

制度本身的不断调整和完善加以解决,而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所在。

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阶段问题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不少开创性的理论见解。195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将来的趋势是:大约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内,基本完成实现“三大改造”;大约在50年到75年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毛泽东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且后者可能比前者更长,大约要花100多年的时间。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阶段性和长期性认识的一个重大进步。但由于当时“左”的错误观念根深蒂固,这一认识未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导致一定时期内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在中国得到了新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一是做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二是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步走”战略。他指明了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但同时还处在初级阶段,必须正视而不能超越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再认识的重要成果。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18]63},“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18]64},并以此判断为根据,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突出了以改革开放为根本战略的发展观,把改革看作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有论者指出,马克思提出新的社会形态经济模式要跨越“卡夫丁峡谷”,同时又要享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但他没有对这一新的社会形态经济模式进行命名,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正是对它的准确命名^[19]。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推动了这一问题在中共党史学领域的深入讨论。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党史学界的知识分子就已经自觉运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去思考和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内容涉及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步骤与方法,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前途等一系

列问题的讨论。如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科学地阐述了中国的社会性质,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20]。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则运用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具体阐释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为之后几十年的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建立了理论基础和理论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史学界兴起五大问题(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论战,党史学界也注重把如何阐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作为研究的目的,其内容包含了历史发展的动力、阶段、目的、发展趋势等重大问题。一批相关的党史著作开始公开出版,如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以及李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等,着重书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同时追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其中有些著述开始重视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和民族问题的研究,并注重按照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开展“通史”研究,显然受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影响,对中共党史研究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在中共党史学界的努力下,党的历史被描述为人民群众如何在革命和生产实践中改善生产方式、促进社会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发展的历史,普通劳动大众的社会生产活动成为决定党的历史发展的基本力量,并推动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在我国不断传播和发展,中共党史学理论在这一时期也得到较为快速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中共党史学科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阐释,发生了从解释阶级斗争如何推动历史进步,到中国传统社会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研究范式的转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社会发展理论在党史学研究中的进一步深化,尤其是“社会现代化”这一概念理论最有影响力。张静如倡导将其作为中共党史学研究的新范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最近几年,不少学者开始呼吁重新重视阶级分析法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认为阶级分

析法是揭示党的历史特有的演变规律的途径,是说明促进历史发展的动因和主体力量。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也日益得到突出,有学者提出,应把生产力标准和群众利益标准结合起来,共同作为评判中共党史事件和人物的标准^[21]。这些观点的提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价值判断立场,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发展和党的历史实际的本质理解的基础上,将中共党史学研究的目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建,以及人类解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是对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理论的重大发展。

三、新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要求

在全球化和科技信息发展所导致的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发生变革的背景下,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式、特征发生了新的变化。如何科学认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时代价值,怎样在新的社会和时代条件下继续运用这一理论,又如何依据新的社会实际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无疑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课题。

第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不是经济决定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偏重于经济逻辑。在论述社会发展理论过程中,马克思经常使用“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认为社会形态演变的最终原因和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经济的社会形态”概念后来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也被多次使用。对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经济论述,一些经济学家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优势,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历史的经济解释是他们的能经久存在的贡献之一。……马克思指出了处于我们价值观念背后并决定它的经济利益的作用”^[22]。但也有一些人据此片面地认为,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历史简单地归结为纯粹的经济运动过程,是一种“经济发展决定论”,具有“宿命论”倾向。对于这种观点,恩格斯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批评,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

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4]477}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的决定性问题的论述至少给了我们两点启示:一是经济上的解释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的基础性。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前提和决定性基础,在阐释党的历史时首先要确定的是,无论人类社会发展到哪个阶段,经济方面始终是核心要素,只有经济因素才能从根本上反映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和总体面貌。二是社会历史的发展是辩证的。除经济因素外,对历史发展进程产生影响的还有阶级斗争、上层建筑和各种意识形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4]696}可见,经济的决定性问题是马克思以辩证的、整体的概念方式来把握研究对象而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考察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理论视角。但它有自己的界限,必须置于唯物史观视域下、联系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的本真思想,以辩证的观点来理解。把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经济解释绝对化,忽视唯物辩证法与社会形态理论的内在联系,只能将马克思主义导向庸俗化。

第二,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至今仍未过时。以研究人类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发展规律为核心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在史学研究中始终占有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它规范着史学的构架并指导其方向。但在当前史学界尤其是社会史研究领域,存在着忽视这一重要理论问题的倾向。有论者指出,当前社会史研究的风向已发生改变,人们往往只注意对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社会生活现象的描述,却忽视对决定整个社会面貌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考察,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我们了解人类社会走向,掌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面,以及更好地发挥人的主动性的最主要的科学和最大的学问。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可以是多方面的,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是主要方面,是“主”^[23]。

这种重个案、轻整体,重考证、轻理论,重狭义、轻广义的研究现象在中共党史学领域同样存在,其结果是使中共党史研究看不到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更谈不上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值得重视的是,学界有人对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提出了质疑和非议,或反对把社会形态学说运用于历史研究,认为它仅仅是基于欧洲社会的概括,是一种线性的历史观;或干脆认为它只是后人的一种误读,否认其普遍性和真理性,甚至认为它是马克思纯粹的意识形态虚构、“理论假说”和“伪科学的命题”,缺乏现实和科学依据。他们通常以转换研究范式或理论“多元化”为名,试图反对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形态这些反映社会本质特征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而代之以其他理论或标准解释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如在以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为代表的西方理论思潮的冲击下,一些学者主张以文明化进程来阐释社会历史的发展。这虽不失为一种流派和观察视角,但实际上并不能科学地反映和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还有一些人提出了“历史发展循环论”和“历史终结论”的理论主张,按照他们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史学将不复存在,中国历史也必将重新改写。有人甚至采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手法,借否定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否定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对于学界出现的对社会形态说的各种质疑和错误认识,陈先达明确指出,五种社会形态说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必然对各民族历史进程具有支配作用”,但它并不要求“每个民族都一模一样的历史发展进程”^[24]。无论是三种社会形态说还是五种社会形态说,讲的都只是一种总的历史趋势或历史发展规律,它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认识的科学性。当前,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增强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理解,探索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方法论,着力批驳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等对社会形态理论的诋毁和责难。

第三,立足新时代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社会发展理论本身也是一种不断发展着的动态理论,马克思为我们创立了社会

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要把它推向前进,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阐发。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对社会发展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运用它对当代社会进行分析,是一项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课题。以社会形态学说为例,不少学者认为,当前时代的新变化和特征要求研究者承认社会形态的多样性或非单一性,并应对此做出新的解释^[25]。也有论者提出,由于“信息社会”和“网络社会”的出现,当代社会形态的外延与内涵都正在发生某种变迁,研究社会形态理论的方法也应该相应地有所改变^[26]。实际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关于社会历史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趋势论述,至今仍没有过时。叶险明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尤其需要坚持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特别是“五形态论”,试图用“全球化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或“信息经济时代”等来代替“五形态论”显然是不妥当的^[27]。当前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所带来的一体化和多元化辩证发展态势,恰恰印证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性和预见性,各种社会形态长期并存,但客观上都在推动着社会历史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归宿演进。新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需要我们直面当代社会的挑战,解决时代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如怎样运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理解中国发展道路,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与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怎样看待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等等。正是在对这些现实实际问题的解答和阐释过程中,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本身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寻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时代价值的基本方式是重新回到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著作,通过对文本的考察,挖掘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层内涵,尽量避免简单地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寻找论据。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28]党史研究既要切入党和国家的社会发展实际,突出时代“问题意识”,根据变化了的当代社会去丰富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又要不断反思我们在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第四,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共党史研究要注重现实思考,这个现实就是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性。如何看待这一历史创造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关系、认识其创造性以及揭示其中的历史逻辑和理论意义,均涉及到党的重大历史评价问题。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的事实是,中国经过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社会形态的局部跨越,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特别是建立“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社会理论的最新发展。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之后又进一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动力、根本任务、基本方向和根本目标,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重大理论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的科学论断,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的创新理论的最新成果,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一是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它要求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总目标、发展方向和发展动力,又要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从问题出发,思考和筹划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方略、历史方位和战略安排,解决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一些重大矛盾和问题。二是辩证阐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系,指出经过近40年的发展,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体现了“变”与“不变”的逻辑统一。三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不仅没有“终结”社会主义,反而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意义。“共同体思想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的

全过程,处于中轴线的地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这一寻求现实的共同体过程中的中国方案,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当代的新发展”^[29]。既深刻体现了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世界历史”视角和哲学范式,也展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着眼全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历经改革开放近40年的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模式”已成为世界性的关键词。随着经济全球化形势的新变化,我国的社会发展模式面临一系列新的风险和挑战。但总体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符合我国历史发展实际和社会发展总目标,代表了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社会主义是一场伟大的社会试验工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苏东巨变使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谷,但这绝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必然”论断不会改变,不能因为社会发展中出现了问题便陷入各种“怀疑论”“渺茫论”或“终结论”的误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性质和发展方向问题上,近些年来学术界存在着两种错误认识倾向:一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二是认为中国当前所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弦易张,是“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五”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30]实践证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重大挫折恰是背离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结果。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惟有坚持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指导研究,增强理论自信与自觉,辩证把握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所揭示的历史规律与具体发展道路间的关系,才能明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来龙去脉,认清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大势。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2.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张静如.唐曼珍.中共党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79.
- [6] 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95-96.
-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54.
- [9] 许俊达.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6:97.
- [10] 郭群英.苏咏喜.“新民主主义论”与“二次革命论”[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1):132-135.
- [11]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617.
- [12] 张旺清,罗玉明.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J].安徽史学,2005(3):104-107.
- [13] 于丽.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新析[J].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1(3):12-15.
- [14] 崔学明.共产国际与“二次革命论”[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138-142.
- [15] 苗体君.关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质疑[J].社会科学战线,2000(2):185-190.
- [16] 邢和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再评价[J].中共党史研究,2012(4):106-113.
- [17] 朱洪.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来龙去脉——早期中共党史问题研究[J].学术界,2013(5):18-40.
- [1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9] 俞吾金.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发展道路[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5-14.
- [20] 中央档案馆.中共党史报告选编[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12.
- [21] 王炳林.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13.
- [22] 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下卷[M].高鸿业,等译.12版.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1293.
- [23] 何兹全.中国社会史研究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3.
- [24] 吕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思辨:访陈先达教授[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7-08.
- [25] 陈新夏.社会形态问题的再思考[J].河北学刊,2004(1):34-37.
- [26] 吴元梁.当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J].河北学刊,2004(1):24-30.
- [27] 叶险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J].河北学刊,2004(1):37-41.
- [28] 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1.
- [29] 张华波,宋婧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可为——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思考[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02.
- [30] 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N].人民日报,2013-01-06.

The Theory of Marx'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PC

SUN Qinmei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as the core of Marx's whole philosophy system, has important guiding value for the CPC's history. It regulate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and guides its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the framework of Marx's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history, development momentum, main body, stage, essence and trend of CPC's history have been deeply explained, and many new viewpoints and conclusions have been put forward. In the new period, the study of CPC history should adhere to and develop the theory of Marx's social development. Dialectical and holistic view is required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theory. We should oppose to reduce or guide it into "economic determinism", "single mode theory" or even "theoretical hypothesis", and replace it with other theoretical standards to expla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It also requires to further analyze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rrectly view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e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China, and guard against the distortion and alienation of the western social erroneous trend towards the nature and direction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Marxism;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social formation;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PC

(编辑:蔡秀娟)

• 9 •